



甘肃当代女性

写作史稿

下

刘洁／主编

GAN SH
DANG DAI NV XING
XIE ZUO SHI GAO

甘肃女作家群以近乎虔诚的态度坚守文学阵地，扎根西部，成为国内少有的女性文学劲旅。他们极富魅力的作品绘制出了陇原绚烂的民族文化版图。打开这幅文化版图，西北边陲地域特色和多民族的绚丽色彩扑面而来，显现了甘肃美丽的山水，以及各族人民在共和国的旗帜下战胜贫穷，走向富裕；告别蒙昧，走向科学突破闭塞，走向开放；安居乐业，欣欣向荣的一派胜景。



甘肃当代女性

写作史稿

下

刘洁 / 主编

GAN SH
DANG DAI NV XING
XIE ZUO SHI G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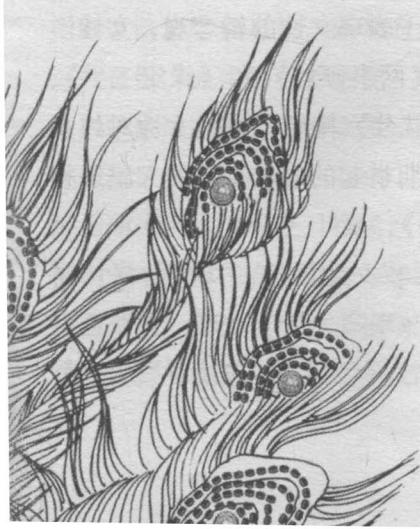
女作家群以近乎虔诚的态度坚守文学阵地，扎根西部，成为国内少有的女性文学劲旅。他们魅力的作品绘制出了陇原绚烂的民族文化版图。打开这幅文化版图，西北边陲地域特色和美的绚丽色彩扑面而来，显现了甘肃美丽的山水，以及各族人民在共和国的旗帜下战胜贫困向富裕；告别蒙昧，走向科学突破闭塞，走向开放；安居乐业，欣欣向荣的一派景象。



第四编

春色满园——新世纪九年的甘肃女性写作

DISIBIAN





□□□

进入新世纪以来，受经济发展波动的影响，中国文学创作边缘化的现象日益明显。但在甘肃女性写作园地却大不相同，发展势头不减反增。90年代已经成名的作家继续扮演着领军人物的角色，而新进作家在刊物与网络上频频亮相。出书和获奖的人多了，娜夜获“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称号，《娜夜诗选》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阿拉旦·淖尔的散文《萨日朗》获得中国散文学会第二届“冰心散文奖”，她还获得中国作家协会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和《作品》杂志举办的“全国青年女作家散文大赛”一等奖；李文华的《再婚》获“甘肃敦煌文艺奖”一等奖；甘肃“小说八骏”之一的向春获敦煌文艺长篇小说一等奖及黄河文学长篇小说二等奖；谷凌云的《红露珠——曼陀花》获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中国作家世纪论坛散文一等奖；汪付芝的《挣钱》获得甘肃第三届“敦煌文艺奖”三等奖，《黄土女女》获得“第十届中国人口文化奖”铜奖；沙戈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提名……这充分表现出甘肃女性写作的巨大创作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新世纪以来，甘肃女作家群写作中的女性意识进一步突显，乡村女性、城市女性、爱情婚姻、生存价值与精神归宿的主题多角度、多方位地出现在各类文学体裁之中，把时代风潮中的女性心理世界表达得更加细腻而真实。

本时期甘肃女作家群在小说创作上做了多方面的尝试和努力，表现出作家们求新求变的时代精神。多数作家侧重于表现女性的婚恋观，女性形象仍然占据着小说创作的中心。张瑜林的《网事倾城》和《缘定三生》、稣烨的《我有迷魂》、薛霞的小说集《女之耽兮》阐释了当代女性对纯真爱情的无尽向往和追求，这和张洁新时期初期举起的追求真爱的大旗遥相呼应。雅兰的《红嫁衣》《红磨坊》《红盖头》，夏叶《田文文案件》通过对女人悲剧命运的展示表达了作家对深受男权文化压抑的女性的深切同情。赵淑敏的爱情小说从感情生活的领域反映现实生活的足迹，女性意识鲜明。苗馨月的长篇小说《都市街灯》从女性视角出发，向读者展示了都

市下岗女工的生存环境以及在面对金钱时表露出来的种种欲望。此外，在历史的追忆与反思中表现人生也是本时期小说的一大焦点。尚彦谷的《红颜泪》以一个新中国成长见证人的身份，记录了位于西北内陆黄土地的庆阳从40年代到80年代的巨大变迁。王君小说《走乡》通过下乡帮扶干部的经历展现了丰富的当代城乡生活，将我国目前西部农村的一些基本状况展现了出来。木茜的小说紧随时代的步伐，将视角锁定在城市男女，写出他们在欲望中的挣扎以及心理、精神上的困惑。严立、文瑞、郑晓红在小说、散文、游记、纪实文学等方面也都有所建树。

诗歌创作上，由于新世纪以来网络的飞速发展，网络诗人不断涌现，为甘肃诗坛不断注入了新的血液。樊樊、离离、草人儿、兰叶子、苏黎等等这些富于诗意的名字越来越引起文坛的注意。90年代业已成名的娜夜、沙戈、万小雪等诗人发挥着领军人物的角色不断有新作品问世。继完玛央金之后的“草原女诗人”苏鲁梅朵以甘南为主要抒写对象，具有鲜明的甘南地域特色。在超现实主义的点染下，苏鲁梅朵笔下的甘南草原充满着灵性的光环。苏黎的诗歌则以朴素平实的笔法再现了地域辽阔的河西走廊，特殊的地域风情赋予诗人豪放的艺术性情。谭梦琳、张粉丽诗歌的意象营造等等都代表着诗歌创作上迥异的个性追求。

本时期的散文创作也呈现多种多样的风格追求。裕固族女作家阿拉旦·淖尔出版有散文集《萨日朗》，玛尔简出版有散文集《我的家园》。她们的散文创作有着极其鲜明的草原地域色彩和宗教情结，字里行间蕴含着人与自然界众生和谐相处的圣洁情感、开放与利他的宗教情结。习习的散文则以清新空灵见长，她常通过细腻的生命感悟与童年的视角，传神地抒写对自然、人生的独特感受。辛小玲在散文中用饱含深情的笔为我们构建了一座浓浓亲情的感情家园，笔调细腻而委婉。孙晨湘、李培洁的散文讲究笔法平实，以类似白描的写作手法展示出生活中的所见、所感、所知，蕴含淡淡的乡土气息。李雪兰、栗子的散文侧重对人生的抒写，突出了积极向上、不弃不舍的信念与坚韧品格的信守。与以上几位散文作家不同的是，李荣珍的散文把视角投向了对西部历史的虔诚追忆之中，在对西部革命史迹抒写中蕴含的深沉的历史感。另外，王君、苏黎、郭晓霞等作家的



散文也具有各自的风格，她们在西部、女性、人生、历史的诸多命题中寻找行文的灵感，表现出西部女性开放的思维特征和力与柔的美学风格。

临夏地区祁凤鸣、王俐平、雍桂英、曹丽娟、冯岩、马萍、马琴妙、张玉兰、赵文晖、全巧英、李萍、马晓燕、马秀梅、高筱等十四位女作家，以女性的细腻和灵气书写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风情、人物风俗和秀丽风光，以女性的韧劲和自尊固守着思想阵地和精神家园，可以说，她们已构成了一个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创作群体，表现了持续发展的极大潜力。

新世纪甘肃女性写作尽管形式多样，手法多变，却都体现出了几个最为显著的特色：一是西部地域特色；二是民族特色；三是女性特色。与上个世纪的女性创作相比，更加突出了新时代女性的困惑与反思。女性形象的成功塑造，女性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女性心理的细腻描绘以及字里行间透出的那份浓浓的女性柔情，与作品的地域民族特色一起大大提升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可以预期，西部女作家群将会沿着这条带有传统性的路向继续走下去，并且会在新世纪的未来时间里出现新的开拓性进展。

第一章

传统与现代的文化交织

——向春的小说创作

向春，本名任向春，1963年生于内蒙古河套平原。198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已有大量诗歌、散文、小说见诸报纸杂志。当过教师，编辑，记者，现就职于兰州《西部发展报》社，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二届高级研讨班学员，甘肃省文学院签约作家。出版小说集《跌入红唇》，长篇小说《鸡蛋放在哪只鞋子里》《身体补丁》《妖娆》（《刀子的温柔》）。小说集《跌入红唇》，获甘肃省敦煌文艺奖一等奖，黄河文学二等奖。

向春的小说创作始于上世纪90年代，成熟于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单凭这几部小说鲜亮的题目——《跌入红唇》《鸡蛋放在哪只鞋子里》《身体补丁》《妖娆》就可以看到这位作家所选题材的冷峻与所思考问题的深邃。尤其是“身体补丁”这样的带突兀性质的名词术语，是那样地前卫。而实质上，她已将探寻、拷问的触角伸向对传统观念的质疑——处女的贞操问题。说她的作品是传统与现代文化的交织，也许是比较合适的。正是藉借着这一特色，她成了甘肃女作家文学园地里的一朵奇葩。

第一节 多种女性形象的塑造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向春的写作意识是非常鲜明的，这从她在小说中所塑造出的女性形象可以窥之一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向春的小说主要围绕女性以及与她们相关的男性而展开。当然，男性只是配角；二是对女性形象的塑造较为丰富，也不失细腻；三是关注女性的个



性、身份、情感、命运等具有一定的深度。从这个角度可以毋庸置疑地说，她的写作是非常有个性特色的，有女作家的独特思维，也有现代女性的时代特色。

就向春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而言，类型较多，有生活在城市的，有出生于农村的，有经历过社会动荡的，有成长在新时代的……可以说，作家对女性有较为广泛的认知，对她们的塑造也较为丰富和准确，因此在文本中构建了一个鲜活的女性群体。总结起来，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柔美多才的都市女性

在小说中，作家塑造的现代都市女性形象，大都具有良好的形象与超群的才艺，她们让男人惊艳，甚至令他们窒息、迷乱，这样不凡的开篇往往为小说的悲剧性基调做好铺垫。《鸡蛋放在哪只鞋子里》的麦子、宋跃、尚可精致得无可挑剔，走到哪里都会吸引男人的眼球，招来女人的嫉妒；《身体补丁》中的谷子、牛哆，也都鲜亮美丽；《妖娆》中的蓝绸子果敢、清秀，米瓜精灵、飒爽。作家还赋予她们超凡的艺术才艺，使她们的外表有了更好的依附与展现的机会，同时使她们具备产生独立意识与行为的基础。以上提及的人物大都任职于艺术领域，在文本中分别为小有名气的歌唱家、小提琴手、诗人、节目主持人、服装设计师、舞蹈家、作家等。

二、“超自我”的青春女性

作家还塑造了几个个性超强，显得有点古怪，又“成熟得惊人”的年轻女性。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鸡蛋放在哪只鞋子里》中的尚书。她有着曲折的成长经历，出生后母亲就离她而去，于是她被寄养在孤儿院，7岁时在超市看到柔情的尚可，便在大门的玻璃上为其画了一只兔子，触动了尚可的神经，于是被尚可领养，开始了新的生活。她性格叛逆，与众不同，有绘画天赋，富有心计，常常离经背道：她为养父而与养母争风吃醋，拿着自己烧制的“多情夜壶”在大街上兜售；她与同样叛逆的男同学交往，共同探索成长的秘密；更为离奇的举动是，她为揭穿自己美术教师

的阴谋、保护自己的家庭，趁其醉酒假造了被他强暴的现场，报警并使其摊上一场官司，使他的阴谋最终暴露。再如《身体补丁》里的裙子，20岁左右只身浪迹他乡，为得到一份电视台的工作不惜出卖自己的青春，为赚钱伙同他人在该市首次开办“心理美容院”（实则专做处女膜修补的生意）以及“夜草莓”处女酒吧，而这两样新鲜事物都在当地掀起了波澜。

三、沉郁悲凄的女性

她们一生中与命运苦苦抗争，承受着人生的酸甜苦辣。《妖娆》中的辛曼，中学毕业后与比自己大30多岁的老师结婚，结婚几天后丈夫就离她而去，于是她开始与比自己小8岁的丈夫的儿子相依为命，将其抚养长大并上了大学，但是又在无意之间有了他的孩子，为掩人耳目只好委身另嫁给一个长着酒糟鼻子年过半百的男人，此后又奔波在为自己得白血病的孩子治病的艰辛路途上。《身体补丁》中牛哆的母亲，被划为“右派”，从上海来到大西北接受劳教，在“死亡”与尊严的考验中，她用自己的身体换取“无耻者”手中的粮食，使自己的女儿度过了极为艰难的岁月，她又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向“无耻者”施以报复。

四、敢于担当的女性

她们敢于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不折不挠，乐观豁达。这种女性的典型就是《妖娆》中蓝绸子的养母。她虽然没有知识，缺乏文化修养，粗陋庸俗，“说话就可以将人杀死”，时常对养女蓝绸子冷嘲热讽。但是，在生活的困境中，她却表现出了强者的风范，她从卖猪肉到开办食品公司，从与丈夫发生婚姻危机直至他去世到再与养女的父亲结合，都表现得从容不迫，坚强果敢。她也不乏慈爱与大度，在刘苏子父母去世后，热情地对他施予关爱。再如《妖娆》中的白糖，从公交车乘务员到下岗自谋职位，从与大学生刘苏子结婚到离婚，从一个健康的女人到有缺陷的女人，她没有过多的抱怨，以乐观与坚韧与命运抗争。

五、献身于城市的农村年轻女性

向春的小说还关注新时代中的农村年轻女性。例如，短篇小说《钻

戒》中的错儿，生活在重男轻女的家庭里，时常受到母亲的责难，念了几年书就辍学回家忙于家务，由于在家里第一次看电视时看到一则关于“恒久远”钻戒的广告，于是萌发了对钻戒的梦想。怀着对钻石光芒的憧憬，她跟随同村的彩儿离家来到城市。开始时她在饭店打工，后来又被包养了彩儿的同一个有钱人包养，当她意识到这一点时，也许是出于自尊的发现，毅然离开了那个有钱人，在发小田金来的帮助下，开了一家蝈蝈店做起了生意，积攒了一些财富。可是天真的她，又投入一个年轻画家的怀抱，可结果又为他人做了嫁衣。错儿是不幸的，她的不幸也是许多走出农村，委身城市的女青年的不幸。

第二节 对女性人生悲剧的多角度阐释

向春塑造了众多现代女性形象，她们要么惊艳无比，要么潮流时尚，要么才华超凡，要么坚韧不拔，要么冷俊凄美，要么天真质朴富于幻想，但是她们大都未能摆脱自己凄凉的悲剧性命运，而是沉浸在各自的矛盾之中。在这些矛盾背后却渗透着作家对“女性人生”这一命题的深度思考与阐释。

一、忠贞爱情与现实社会的背离

建立在爱情基础之上的婚姻无疑是幸福的，这也是现代女性勇于追求的东西。可是，当她们追求的爱情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甚至被现实消弭时，她们会有怎样的表现呢？向春的小说对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我们来分析以下几个女性及其悲惨的命运。《妖娆》中的蓝绸子十多岁就喜欢上了她的舞蹈老师——一个天津知青，这种感情成了她人生中挥之不去的阴霾，并没有因为天津知青的离开而从她的意识中消失。纵然她后来结婚了，事业也取得了很好成绩，但是她并没有为这一切而高兴过，没有流露过一丝幸福的微笑，舞蹈老师的影子一直缠绕着她，现实中的婚姻则变得“貌合神离”。二十年后他们重逢了，当初的舞蹈老师不但没有认出她，反而把她误认为是一个大酒店里要价不菲的绝色妓女，拿着十万块钱与她

苟合。爱情与现实的背离使她精神彻底崩溃，走向迷途。这种情愫最终以畸形的方式爆发出来了，她拿起“温柔的刀子”，刺死了自己的丈夫，毁灭了自己，留给读者一个凄凉的回忆。

从这一角度，我们来解读《鸡蛋放在哪只鞋子里》这部小说，同样可以看到女性在爱情与现实背离之后处于错乱状态之下的一种凄美人生。麦子与梁果在中学时因同在学校文工团演话剧而相互认识并产生恋情，后来麦子母亲去世，她成了孤儿，被舅舅领到另一个城市生活，她与梁果的感情也因此未成正果，结婚后的麦子与画家丈夫过着不痛不痒的生活。10多年后，梁果的出现使她沉寂多年的情感重新荡起涟漪，她无法拒绝梁果抛来的“橄榄枝”，背着道德的十字架与之进行了灵与肉的结合，以至于在梁果双目失明后，她不顾忌自己的重病，毫无怨言地扮作护理员来到他身边，并在临终之前将自己的眼角膜捐献给梁果。在这个故事里，麦子的悲剧也许是命运的悲剧，但是在这背后，更是爱情与现实背离后所产生的悲剧。

二、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冲突

向春的小说也涉及男女性爱问题，这是她的小说受到诟病的原因之一，但是她对性的描写绝不是“下半身写作”式的欲望渲染，而是借此阐释现代女性的生命意识以及其中所蕴含的道德危机，于是作家笔下的性描写有了两重的意义。首先是对生命意义的张扬。性爱是孕育生命的，也是释放生命激情的。以上提到的部分现代城市女性好像不再受到传统贞操观的束缚，如麦子宋跃等，把“做爱”一词常挂嘴边，拿它与其他感受体验相类比，以此宣告她们对“谈性色变”的时代的决裂。作家还描写了尚可与高凡在山庄草地上交合的画面，无不显示着生命张力，以至于使尚可重新焕发青春的活力。然后她们并没有因为这种生命的激情而改变人生的悲剧，显然作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并没有停留在生命自然本能的层面上。

其次是对传统贞操观的现代审视。小说中，作家涉及的另一个敏感话题就是“处女膜”。在《鸡蛋放在哪只鞋子里》这部小说中就涉及这个问题，在《身体补丁》中更突出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处女膜在传统文化中

是甄别女性贞操的东西，承载着较为复杂的文化意义。然而，由于现代医学使修复“处女膜”成为可能，进而使传统贞操观受到极大的挑衅。于是，传统文化与发达的现代科技的极大矛盾带着无法回避的荒谬性被作家揭示出来。作家由表及里，试图审视的是现代人们的道德观与价值观。

《身体补丁》这部小说很突出的问题就是“身体补丁”，实际是“处女膜”修复手术。何必医生与妻子离婚后，为偿还妻子的离婚补偿款，与裙子合作在他生活的城市开办了第一家“心理美容院”，专为失身女性做“处女膜”修复手术，生意异常火爆。而前来做手术的女性则各有目的，如还是学生的韩冰冰（袜子）先后几次将自己变为处女，骗取了几个男生的财物，毕业后又莫名其妙地混进了所在医学院做教辅人员，或许也得益于这种手术；再如裙子经人撮合，通过将自己的“人工处女”之身奉献给市委书记的秘书牛西，换取了在电视台工作的机会。不难看出，当“处女膜”能够修复时，部分别有用心的女性则充分利用这种资源，使那些具有“处女情节”的男人在神志不清之中被她们所用。在这种“性与政治”的交易中，既表现出了现代女性生存的艰辛与迷惘，又阐释了现代文明与传统贞操观的冲突。在这里，“性与政治”的悲剧演变成了“骗与被骗”的道德危机，而其背后则寄寓着作家对传统贞操观的重新审视与对现代道德观与价值观的拷问。小说中，作家对这种女性寄予同情，又不动声色地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虽然她们献出身体换得物质或政治利益，但是无法摆脱良知与自尊的追问。裙子因得不到何必的爱情而痛苦，又被电视台台长以派出深造为由安排去了外地，离开工作岗位；袜子则时常受到与她有染的两个青年的追讨，最终对簿公堂，在当地引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论。而作者对此最为辛辣的批判在于对具有“处女情节”的男性的讽刺，当牛西背着妻子得到裙子“人工处女”身体之后，激动万分，在以自愚的方式了却自己多年的心愿之后，突发心脏病撒手人寰。在这些匪夷所思的情节演绎中，作者不动声色地将传统与现代文化交织在一起，使人们不同程度地有所触动。

三、理想与命运的错位

向春的小说还阐释了女性的悲剧与其命运的关系，以此来探讨“人是

否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这一老命题。作为小说人物悲剧之一的命运悲剧，是中外小说史上许多小说家试图表现的一个题材，向春对此的回答也许具有一些宿命的影子，但其背后则是历史的悲剧与性格的悲剧。《鸡蛋放在哪只鞋子里》中的麦子，“从母亲那里遗传的不仅仅是容貌而且还有命运”。作为一个优秀的歌唱演员，她在自己35岁的生日，重复了母亲的命运，在演唱《梅娘曲》时声带突发病变，从此失声，早早就结束了自己的演艺生涯。如果说失声是生理上的病变，而情感上的危机则成了心理上的病变，她与母亲一样，在此后的日子里，不但失去了歌声而且远离了爱情，开始迅速凋零枯萎。《妖娆》中的牛哆，同样是一个充满活力与富有理想的女性，但是她无法摆脱历史及其母亲凄惨的命运给自己预设的桎梏，含辛茹苦，将自己母亲与自己心中的恋人所生的孩子牛西养大成人，而牛西又在自己亲生父亲的自私之念中英年早逝，如此悲惨的命运叠加在她身上，她彻底崩溃了，最后选择自杀的方式了却余生。

四、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之间的隔膜

向春的小说涉猎城市与乡村两个背景，但是她不是表现它们之间的和谐，而是刻意突显它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短篇小说《钻戒》中的错儿带着“钻石光芒”般的梦想来到城市，以自己的美丽、质朴、善良换来的则是粗鄙、虚华、险恶，更值得思考的是，她面对城市的诱惑，竟毫无一丝抵抗能力，委身就范。她虽然得到了城市的锻炼，在城市里找到自己新的发展空间，但是却失去了原有的一些优秀品质。

就此，我们可以看到向春的小说是尖锐的，甚至可以说是残酷的。她直面现实人生，揭示的是女性人生的悲剧与悲剧的人生，她笔下没有一个真正幸福的女性，她以冷峻的笔调，将不同女性放置在不同的困境之中，在调侃戏谑之中展示了人性残忍的一面，在普通的题材中显示了不平常的主题。这正是作者对女性的一种深度关怀。

第三节 灵动的小说语言与多变的叙事方式

向春小说的语言与叙事方式也是值得品味的。灵动的语言与多变的叙

事方式结合在一起，使她的小说具有一定的“先锋意义”。

（一）独特的小说语言

向春小说语言的特点可以概括为：简洁、细腻、幽默、跳跃，富有哲理与色彩。也正是这样的语言使她的小说有了较强的可读性，同时增加了小说对特定环境中特定人物处境的表现力。而达到这种语言效果的方法就是作家以女性对语言特有的感悟能力，用简单的词语与句式以及多种修辞手法来表情达意，于是她笔下的词语产生了较强的陌生化效果，那些极为普通的词汇经作家的调整组合，重焕生机，营造了多层的语言界面。

向春善用比喻，她拉大本体与喻体之间的间隔，在强烈的反差中增加了所要表现事物特征的深度，使语言产生了较强的张力。我们试品析以下句子：

“只有我的母亲瘦得像只皮影”（《妖娆》P3）。“我好像天生就心疼蓝绸子，仿佛是一杯水，我怕她洒；仿佛是一只杯子，我怕她破”（《妖娆》P16）。“在这个繁华的都市里她看上去像一块用旧了的抹布”（《妖娆》P254）。“她想艺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咒语，时辰一到在劫难逃”（《鸡蛋放在哪只鞋子里》P2）。“接着她的脑子里出现空白，像甩出蛋清和蛋黄的蛋壳又空又薄又脆”（《跌入红唇》P134）。

而作家对通感手法的灵活应用，往往也产生了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试分析以下句子：

“这个水灵灵的早晨，金来同往常一样是迈着急促的步伐走向蝈蝈店的”（《跌入红唇》P66）。“我想起了去年的春天，我被稠密的梦绳子般捆绑的那个春天”（《妖娆》P257）。“下班的时候，谷子的心里毛毛的潮潮的”（《身体补丁》P2）。

此外，作者常常用反差较大、富有色彩感的词语来修饰所要描写的对象或者说明某种事物发展的程序，在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作家试图要表现的意思。例如，“一匹丝绸一样的女人极易像水一样流走”（《妖娆》P179）。“米瓜是个人精，她的眼睛深入骨髓”（《妖娆》P186）。“我淫浸在吉黑暗掩盖下的腥甜的气味里，体味着思念的腐烂

和腐烂的快乐”（《妖娆》P186）。“母亲盘腿坐在炕沿上不说话，她很少这样节约自己的嘴”（《妖娆》P53）。“她闭着嘴表情庄严，眼眶子乌青的，像两枚生了锈的铜钱”（《妖娆》）。

（二）多变的叙事方式

向春小说总体而言，结构明快，情节精简，人物较少，主题鲜明，但叙事方式则是多变的。以上提及的三部长篇小说的叙事方式也是各具特色的，显示着作家较强的小说叙事能力与结构能力。

《鸡蛋放在哪只鞋子里》，以全知叙事的方式讲述了三个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纠葛，以麦子和梁果之间的感情为纽带，将其他人物紧密地串联起来，形成了一个单一而又严谨的叙事结构。叙事声音由小说中在场的人物来轮换充当，充分展示他们各自的心理变化。《身体补丁》，在形式上具有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意味，即将小说分成若干个章节，每一节又起一个新颖的题目。小说没有一个起统领作用的中心线索，而是以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变化而变化。小说情节的发展也不是线形的，作家利用追叙、插叙等方式营造出了一种“山重水复、云遮雾绕”的效果。较为特别的是小说后半部分的情节，作者是利用文本中缺席的人物牛哆的十几封电子邮件来推动的，通过这些信件向读者解释了小说上半部分预设的一些悬念。这种叙事方式，一方面使小说充满了神秘感，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另一方面增强了小说的悲剧韵味。《妖娆》在形式上是“复调”的叙事方式。小说分别以小说中的两个人物——刘苏子和蓝绸子作为叙事者，让他俩以“一人一章”的方式交叉讲叙各自所见的事情。两个叙事者以各自的视角出发，以第一人称“我”作为文本中的叙事声音，相互印证，在讲述自己的故事的同时，也讲述了别人的故事。他俩所叙故事相互交织着，构成了小说的整体情节。

此外，向春在结构小说故事时，还具有明显的“俄狄浦斯情结”以及这种情结的多种变形。《妖娆》中的刘苏子仇父恋母，并且与继母发生关系生了一个孩子；蓝绸子仇母恋“父”，暗恋大自己十二岁的舞蹈老师。《跌入红唇》中的宁可十二岁时爱上自己的小学老师，和老师的影子过着梦游式的单身生活。《身体补丁》中的牛哆将自己的弟弟牛西当成自己的



儿子来抚养，并且暗恋自己母亲的情人。《鸡蛋放在哪只鞋子里》中，尚可与自己的养女尚书都与画家高凡产生恋情。

结语

在河套平原上长大的向春，带着几分豁达与妩媚，在当代文化背景下，辛勤耕耘在小说苑里，使自己的园圃不断繁茂丰硕，成为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向春在自己的园地里，以女性的视角透视女性以及周围的男性，在斑斓妖娆的都市和宁静质朴的乡村，体谅着女性的容颜、理想、情感与命运，并将她们构建在自己的文本世界之中，使她们鲜活起来，于是，她的小说成了书写女性命运的“当代资料”。向春塑造女性，在形式上追求东方古典美的韵味，在内容上则从悲剧的命运中审视人性的真与伪以及女性的生存困境，因而她的小说有一种深沉的凄美感。作家将文本中的女性桎梏在各自的矛盾之中，将美好的东西不留情面地撕破让人去看，通过她们的毁灭或沉沦或枯萎，来展示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女性人生中悲剧的一面，以期探寻女性人生的终极意义与目的。与此同时，作家以一种寓言式的小说叙事解构了我们所建构起来的或者正在试图建构的一些事物，使原本美好的东西显示出丑陋的一面，原本丑陋的东西显示出几分美好来，原本阳刚十足的男性在女性执著的情感世界里显得猥琐、阴暗……所以说，向春的小说在冷峻、幽默之中显示出了犀利与残酷，她对女性的关怀并非表面的戏谑，而是深度的虔诚，剑锋直指现代社会的病灶。她虽然没有对此开出药方，但真诚与坦率洋溢在字里行间。

也许正是由于固执于以上的追求，向春的小说难免走向概念化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在女性形象塑造方面，有时过度强调女性的凄美感而忽视女性的朝气，过度强调女性的偏执而忽略了女性的灵活；在语言上，有时为了刻意追求调侃效果而忽视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有时为了强调某种观念而过度议论、忽略了对故事本身的叙述。

第二章

亲和·诚挚·敬畏生命

——阿拉旦·淖尔的现代草原叙事

裕固族女作家阿拉旦·淖尔近年来颇受瞩目。2002年4月，散文《萨日朗》在《美文》发表后，被十多种报刊转载。此后的写作愈加顺手，先后获得“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全国青年女作家散文大赛一等奖”、“甘肃省敦煌文艺一等奖”、“首届甘肃省黄河文学二等奖”、“第二届冰心散文奖”、《中国第六届全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创作新秀奖》等奖项。2006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散文集《萨日朗》。

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今天，一个年轻作家何以受到读者如此青睐？研究者们对此多有论及。林非认为，“她对于自己生长于斯和歌于斯的大草原，有着异乎寻常的感受与体验的才气”^①。郭艳认为，阿拉旦“通过对于草原牧场的重新定义和解读，拥有了一座自己的牧场——一座牧羊女想象中的心灵牧场”^②……简而言之，研究者们的评论至少在这一点上是达成共识的：阿拉旦的创作独特，包含有别于都市文化与农业文化的草原文化意蕴。在当下散文创作普遍偏向个人化、私秘化心理感受的整体情势下，这种蕴含草原文化意蕴的写作无疑具有葱茏鲜活的生命气象，难怪受人瞩目。

草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它包含天人合一、敬畏生命的哲学思

^① 林非《萨日朗·序》，阿拉旦·淖尔《萨日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3页。

^② 郭艳《阿拉旦的心灵牧场》，阿拉旦《萨日朗·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216页。